第二章 城鄉流離

颱風會直撲花蓮嗎？一早雲靄低沈，微雨氣悶，天際線壓低到田地的盡頭看不清分野。

盛全老神在在：「六月底稻子才收成，現在稻田都在整地，最不怕風吹雨打。」

下雨不宜噴草，所以盛全今天中斷了連續數日的稻田農藥噴灑工作，我也總算能夠遠離毒氣區，遠征陳順明的西瓜田。雨勢不大，西瓜農務還是不能停。

「颱風帶點雨來也不錯，天氣實在太熱了。」陳大嫂說。她全幅武裝，斗笠、長巾遮臉遮脖、長袖套，舊長衫，加手套。。

種西瓜，最費工的就是牽藤，三五天就要隔離兩株相連的藤蔓，以免纏綿過度，相互干擾。七月初，第二期的西瓜才剛結果，一個個白嫩青葱如香瓜，圓滾滾。我跟著大嫂拿長竿勾子分株，深怕一時眼花拉傷藤蔓，乾脆蹲下來以手代竿，像小狗在田裡翻食，速度自然不如人，但也少了失手誤傷葉脈的風險，還能精準挑瓜。

此時挑瓜，還不是選出最好的那顆。相反地，是挑出那些長得特別快，不合時宜的瓜果。當多數西瓜都才不到巴掌大小，總有那些時序超前，營養過了頭的西瓜，像小六生誤入幼兒園，鶴立雞群，特別礙眼。我們手上這些早熟的少年瓜，都是牽藤時要及早趕盡殺絕的，剪斷臍帶，任令其早么腐爛在田中成為其他幼兒的養分。為什麼？這些早熟的西瓜，出類拔萃，成長過快。但這是二甲地的大型耕作，作業程序一致化，它們就算長大了也等不及齊頭收成，只會率先熟爛在田裡還造成果蠅的困擾。如此，只好先斬斷生機，防範於未然。

西瓜農事如今多是商品耕作，要符合商品價格的要求，一株只留一果，務求集中養分長成最大最美最無蟲咬的那一顆，品質才有穩定性，價錢才能提昇。至於那些在集體耕作中，弱小跑不動的，或相反地跑太快而過早成長的，只能在每次牽藤時一一狠心摘除，讓位給最終的優勝者，獨佔所有養分，順利成為市場上賣相好的玉里西瓜。

隔壁看顧柚子園的阿姨騎摩托車繞園探看，憂心忡忡說：「怎麼辦？颱風這時候來了就完了，我們的柚子還不能搶收，你們的西瓜也糟了！」

柚子七月轉熟，再等一個月就可以採收了。此時颱風若來，搶收了甜份還不足，若讓強風吹落地，根本不能吃；若勉強撐過風吹雨打，灌了水又怕稀釋糖份，滋味不夠好。柚子一年一期收，緊急時節來了颱風就是全年血本無歸。

順明口裡叼根未燃菸，閒閒回應：「你擔心你的柚子不必連我的西瓜一起拖下水，一次死一個，嗲牽拖。」

「颱風不來最好，大家都沒事。」

「你的柚子現在才六七分熟，沈殿殿，最怕颱風吹落地。」順明乾脆拿下菸，科學分析起來：「我的西瓜還沒垂藤，果實小，吹不怕；葉子若是泡水爛了再長就有，勿免驚。」

阿桑和我們都笑了。確實是蔬果有時，天無常。

1・五百元的代價

西瓜田的那一頭走到底，就是八通關，越過整個中央山脈抵達玉山口，再過去就是埔里了，順明的原鄉。

順明的爸爸原居南投，台灣唯一不靠海的縣市，好山好水，埔里女孩都膚質清淨出美女。爸爸在日治時期讀過幾年書，年少時就投入樟腦油製程做工，也因而免去了被徵召打仗的命運。彼時樟腦是特許行業，有牌照才能做，也有一定的社會地位。二戰結束後，樟腦產業仍興盛了好一段時光，油好質精，要價不菲，專攻外銷，是台灣外匯的重要來源。當時的煉油工人若打架被捉入警局，主管樟腦油廠的爐主出面向警方要人，就會立即獲得釋放，可見得其特權。

陳氏一家就隨著樟樹砍伐的腳步，由西部遷移東台灣，最後落腳玉里。父親買下一甲多的田地，全家人就此落地生根。

位於山腳邊的老家，是順明的父親六十年前自蓋的木造房子，依山面田。我們站在門前吃瓜子，順明一揮手指向屋後這一整片山、及眼前舉目所及，在當時都植了樟樹，長成後整棵挖掉、鋸成材塊，再壓碎榨油。屋前的田地下窪有個引水池，當年就是在這裡熬樟腦油，老屋旁還留著鏽蝕多年的老機器，作為歷史的見證。

作樟腦油也是粗重活，先是燒材用蒸氣熬煮榨油，直至冷卻了再引管流出，一噸材就可以榨出二十幾公斤的好油，多是政府集體收購了外銷或製藥。那年代，大家都窮，順明從小就要和爸爸一起勞作，但樟腦油價值不菲，他們也算是稍有餘裕的家庭，田產家產都不富有，但也不缺。

「有田就餓不死人。」父親和他當時都這樣想。

戰後經濟轉型，政府不再收購樟腦油，民間也多改用化學製油。短時間內，油價從一公斤五六百元急遽下滑至一百多元，種植採收已不敷成本，爐主也不堪虧損倒閉，順明甚至被積欠了好幾個的工資沒拿到。

「那時大家比較講情面，鄉下人也不太會計較，資遣費什麼都沒有，自己頭殼摸摸就去找別的事頭做。」如今已然經歷過抗爭、拉布條、打官司討公道的順明，拉開歷史距離這樣回頭定調。

三十歲，順明的製油生涯結束了，改開拼裝車。台灣經濟起飛時期，四處都在蓋販厝、蓋工廠，河床邊毫無管制一檯檯都是砂石車，直通鋼筋水泥攪拌的建築工地。那時候，沒牌照的拼裝車日復一日奔馳在產業道路上，清運沙石、水泥、建材及廢棄物，工作接不完。之後警察開始捉無照的拼裝車，順明和大嫂就進入玉里的小型飾品外銷加工廠，數年後工廠遷移至大陸，他們又遷移到台北的自助餐店打工。

九0年代初，台灣大型的公共工程人力需求很高，一方面由政府立法正式引進外籍勞工以大幅降低建商的人力成本，另一方面也由因製造業關廠失業、或來自偏鄉的勞動人口填補粗工的空缺。1992年，順明來到北二高安坑隧道工程，受聘於日商青木在台的子公司竹和營造，專門外包接青木的案子。

北二高未完，順明就被調去做捷運工程，從事隧道開挖的工作。這是緊急的搶修工程，聽說是台灣頭一次引進的高科技壓氣工法，進出坑道都要經過加減壓艙，工資相較於外面的行情也高了一些。人手不足，作為領班的順明，就返鄉找了舊日同窗定安，並召募了一些鄰里間待業的年輕人。

阿義、志誠、盛全的父母，也是順明與定安的同輩舊識，他們長年留在原鄉務農維生，像台灣所有的農村父母，終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將孩子們推離農村，進城發展。因為農價差，未來沒指望，終止學業的農村青年也唯有離開農村，向外遷移。順明和定安就像被託孤似地領著這些年輕人，一路北上來到捷運工地。雖說是受聘於竹和，但有做才有錢領，壓力坑道的工作一天二千七百元，非壓力坑道的開挖則一天二千二，當然大家全選了坑道內作業。

誰料到五百元之差是賣命錢？

坑道裡的工作，無非是搬運、開挖、裝隧道簧片等，還有人負責噴漿，溫度高達四十度，才剛入坑就全身都汗流浹背，一直到工程末期才裝上空調，但坑道深處的泰籍勞工是無福享用的。密閉的壓氣坑道內，空氣中總帶著霧氣，空間瀰漫著消散不去的泥土味、屎尿味、粉塵與有機溶劑，視線大受影響。整個坑內沒有廁所，大小便都只能克難解決，有時以強力吸收廢土至坑外的大型吸管，也一併把惡臭的糞屎也一併吸出去，眼不見為淨。但那惡臭味還是留在壓力坑道內，久了也就習慣了。

一直無法習慣的，其實是迴盪不去的機器開挖撞擊岩壁，迴家加劇的噪音撞擊，轟隆隆震得耳膜發疼，當時就有工人耳膜破裂，再也聽不見的。之後多年，我也陸續得知很多工人都有聽力大幅滑落的狀況。順明常常覺得那悶壓又迴盪不止的轟隆隆聲音來襲，相對的，很多細微的聲音都早已被掩蓋，聽不見

了。

當時的高科技捷運工程，設備逾億，成本昂貴，預示著一個邁向國際化城市的美夢。但工人入坑卻缺乏培訓，早期入坑的工人還有上課的記憶，甚至要通過考試取得執照才能入坑作業。那考試，根本是任何人都會通過，這群中年工人不熟悉文字考試那一套，公司公然作弊也情有可原。問題是，這麼危險的工作，為什麼不把危險性都用白話口語、實務與圖文教學，讓工人們提高警覺呢？悠關生死，終生無以痊癒，若早把利害關係說清楚，工人難道還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嗎？

一開始就沒作好把關，很多工人根本沒上過職前訓練，考取的證照幾乎都放在工地僅供檢查用。至少阿義、盛全、志誠沒上過課。勉強找到上過課的領班許大哥，他回憶起整個受訓過程，根本沒提到潛水夫症，考試時更隨便，不識字的人也可以輕易考取證照，完全是做做樣子，沒當一回事。

「才做二年工，換來一身的病，不划算。」許大哥每每說著就嘆氣：「那個痛，全身跑，用拳頭打自己的骨頭也止不了。」

當然我也知道，無資力者在有限的條件裡，能作的選擇不多，就算知道嚴重性，很多人也許還是會甘冒危險去工作。但包商或捷運局是否把工人的健康，與工程的結果等同看重呢？如高科技電子廠的工人，進出入生產線都得換上無塵衣，一絲不苟，不會有人為了加快速度而任意帶進灰塵。為什麼？因為無塵與低溫，保護的全是電子晶圓產品，一但受污染就成不良品，無法成為有價商品。為了保護生產產品不受污染，整個進出入的防備會做到足，違反的工人還會遭受扣薪處罰。

「我有聽說有人去海軍醫院治療，但一次治療要一整天，我們是點工制，沒做沒收入，誰要請假去看病呢？」盛全說，他和很多人一樣，仗著年輕力壯，相關嚴重性一閃即逝，得過且過。

所以，又要來怪罪工人不自愛了嗎？就算加減壓程序沒做完備，如果工人一旦身體有異狀，就被緊急送醫，高壓氧治療及時將氮氣泡在體內壓碎排出，一次六小時的療程又有專車接送，又輔以公傷假治療，難道那些倒撲在坑口的工人會不知道自救嗎？人命不如商品值錢，工傷不如工程重要。事前的防範與教育沒用力做到底，施工過程又沒有專人負責把關加減壓時間，事後的急救送醫又全靠工人自己負擔，這些都是不教而戰，謂之虐。虐殺工人，無非就是在每個工程環節降低生產成本，提高雇主利潤。

要充分預防，要達到安全勞動，無他，多費事多花錢而已。可是雇主為了省錢省工省時，最後出了事，卻怪罪工人貪圖方便，任意減壓出艙，怪罪工人不好好醫療，導致身體一路敗壞、破損。

工人輕忽，是因為沒條件，沒條件認真對待自己的身體，不管是上工前後都一樣，因為勞動現場也從來沒把他們的身體當一回事。不像晶圓成品或工程品質那樣的受到寶愛與讚美，像是真正有價值的都是物品，不是人。

2・種田的人買不起田地

二年的捷運工期一結束，順明、定安和盛全就轉到雪隧了。做了四十天，順明看這隧道工程艱辛，爆破危險，事故連連，心裡也難免害怕。雖說包商提供宿舍、交通車接送工地往返，但他都快五十歲了，孩子也都開始就業，經濟壓力小了些，命還是比較重要，於是決定返回花蓮。

回到原鄉，幸而有田地。老爸留下來的田地，果真餓不死人。他開始從頭種西瓜，學新技術，還有日新月異的肥料與農藥，以及耐藥性一代比一代強的新蟲害。

「有一年我種小玉西瓜，有個前輩來巡田，看半天，跟我說可以摘掉二十顆，再重新長過。那時，西瓜已經種三個月長很大了，實在捨不得採。前輩說你先摘掉二十顆，再和其他的瓜比較看看，哪一種好。」順明來到田裡就愛講古，西瓜寮就像廟口，泡茶論天下，隔壁田裡的農人忙完了也過來坐，順手送過二顆南瓜，大嫂也拔了一袋子九層塔回禮。

順明繼續開講：「他走後我一直想，想到第二天，決定叫工人把一千顆小玉西瓜全部採掉。一個禮拜後，前輩又來巡田，看到就罵：我叫你摘掉二十顆試試看，你卻全採光光，這樣怎麼比較好壞？我說，前輩你一定不會害我，這次試了有效明年再種才會賺錢，可是我們沒什麼本錢可以慢慢試。再種失敗一次，錢賠光了就沒機會了。」

「結果呢？」即便早知道答案，我們還是聽得緊張了。

「那一千個小玉西瓜，每一個重新長都很漂亮，那年以後我種西瓜才開始賺了。」順明說的時候，由衷感謝：「以後每一年，這個前輩都會來指導。種田的人不會藏私，學了什麼都會互相交換，沒有誰在拼誰比較厲害啦。」

順明學了經驗，也傳授給隔壁田裡的農人。但有人捨不得採掉，瓜雖然熟得早，但就是沒有重新長的西瓜漂亮，順明的西瓜一斤多出一塊錢的價格，收成晚但獲利佳。

「沒有一起拔掉重來，整個田裡的西瓜大小不一，形狀不全，採一百斤但可以吃的可能不到一半。要整塊田賣給人家採，人家也嫌費工不要。」

聽起來簡直是軍事化管理。大型農作的特色，去蕪存菁，一致作業才能節省人工，那些一次採收中沒能瓜熟落地的，之後長得再好也只能留在田裡爛掉

成堆肥，無法成為零售的商品。但當年讓順明站穩腳步的小玉西瓜，後來也沒再種了，市場上大又多汁的綠皮紅肉西瓜，銷路與價錢都好，也成為他田裡的招牌商品。

回鄉種了十年西瓜，已然穩定了，順明今年就租了四甲地，種二萬株西瓜，一甲地的一年租金是二萬元，量大成本也高，賭注大。灌水、撒藥、施肥如今都已然自動化了，田裡有水管，總開關可以控製水量大小，黑色膠管沿著畦溝遍佈西瓜田，一天數次的灑水工作，就是烈日下人到現場控制而已，技術含量不高。撒藥和施肥，就有點經驗談了，放多少比例，多長間隔，都是一點一滴經驗學來的。只是藥愈下愈重，農人也心驚。

現在的瓜農早已失去育苗、催芽、洗滌幼苗的技術了，直接到育苗田買苗到田間定植。整地作畦，西瓜根系分布廣且深，廣可達地表三米，深可達一點五米，所以整地很重要，深耕才能促使土壤疏鬆，易排水。種苗後，會鋪設打洞的黑色塑膠布，防風又保溼，可以罩住以保幼苗不受寒流侵襲，或豪雨沖刷；也可增加土壤溫度，增進果皮色澤，降低對光照的反射，還可以驅除蚜蟲、薊馬，降低病蟲害的感染率，又可以防雜草以增加產量。這是個大工程，但絲毫馬虎不得。

瓜蔓抽出後，要人工牽引使其與畦溝成垂直伸長，不可相互繞打結，造成開花不良不易結果。「牽滕」是例行工作，看到糾纏就要去撥開，莫彼此拖累。有的瓜葉長得沒力，支撐力不夠「倒滕」了，也要及時處理，摘掉重來。等瓜籽長大些，就要來「分瓜」了。怎麼分？摘除幼瓜，留幾個看來還成氣候的，再長大些，就要「選瓜」，一株只選最好的那一顆，選好以後就專心照顧它，營養不要給別人搶去。

分株、牽藤、選瓜全是偷懶不得的勞力密集工作，靠大嫂召募一批女工來負責張羅與調派。順明是做不動了，他的身體彎不下來，二十年的痠痛聚積在固定的股骨與膝關節，今年起他甚至要撐著登山杖才能行走。身體提早折損，是營造工人的普遍現象，他們日薪高，但毫無保障，只能單次賣體力，再賣，一直賣到沒法子再賣出好價錢，就要自己負擔過度消耗的後果。身體都記得，債都是要償還的。

「我們農民種田不能自己幹，要大家一起協調，時間分配好，才不會亂。」順明說起農務，充滿自信：「什麼時候開始種，也是要看節氣，不是那個時候種就不會好吃。」

沿著東台灣的海岸線，五六月間，玉里的第一期西瓜收成，再往北走，瑞穗、鳳林一路相隔數日出貨，七月初換宜蘭西瓜上市。再來玉里的第二期西瓜要趕在八月中旬前出貨，約莫是農曆七月半鬼門關開，上市正好應景趕上中元節拜拜。再晚，其他種類的水果全都上市，市場上夏日水果的選項多了，價錢

就差了。

如此推算，玉里第一期西瓜十二月就該動工了，整地除草，一月種下瓜苗，到五月初收成。結束後五月中旬又要開始整地，第二期夏瓜熟得快，密集再忙二個半月，七十天的養植，到八月中旬就可以收成了。夏秋之際，是西瓜工的農閒時分，有的農地也趁這段空檔種冬瓜，九月開始種，三個月收成，再來又要整地種第一期西瓜了。

花蓮的西瓜工其實不只是花蓮在地人，西瓜收成時，人力需求大增，很多屏東、台東、宜蘭來的人，沿著花東縱谷一路從南到北順著收成季的時序，一站輪一站遷徙式地採西瓜，像上北部做板模工的原住民，組一個工班隨著工地遷移討生活。像太麻里的西瓜，就是花蓮這邊的人組工去收成，島內的遷移一直順著生存機會流動。

「未來可能要引進外勞才能做了。」大嫂每次都在煩惱人力，一年比一年煩憂：「我們做西瓜工的都是六十歲以上的女人，再做也沒幾年了。可是村子裡的年輕人都外移到城市了，這些老的都做不動了，誰來做呢？」

我嚼著檳榔，滿嘴都是紅汁不敢一口吞下。我知道正確答案是，若工錢提高了，就有人做了。但工錢提高了，有限的農業利潤如何撐得下去？整個台灣農業、農村、農工問題，根本是環環相扣，無以個別解套，需要政策性挹注國家資源來解決的。這些，農民們不是不知道根源，只是現實這麼難以撼動，不敢往前想。

「好比我們去做捷運，如果多花一些錢做好安全措施，工人也不會得病。」順明倒是看得清楚：「農村的打工如果薪水要高，那就要保障農產品的價錢，否則農民也不敢種，政府又補貼休耕，最後大家都不種田了，什麼都吃進口的。」

「現在農地都可以自由買賣，價錢炒高了，我們想種田的也買不起地了。」盛全說，指向前方一塊農田中的一棟別墅：「你看，這都是西部的人過來買的，農田也沒在做，也不租人，就等著土地變更。房子不夠，有錢人買很多棟，政府也沒有管制。」

「有錢人賺錢比較快。炒作土地最好賺。」順明說。他已是這一群工人中，相對最有條件的了，但比起投資客，賺的全是辛苦錢，還要承擔天然災害與人為市場的風險。

這二十年來，政府由藍到綠，再由綠到藍，再返回綠，有關土地與農村的政策可是一以貫之，毫無二致。什麼時候風暴會吹到農村也待不下去呢？沒有人知道。

3・配合農閒時分的街頭持久戰

二十年前抗爭時，我就知道花蓮一批人若不是種稻就是種西瓜，當時籌畫抗爭行程時，總要優先考慮農忙與農閒。錯開農忙時分，才能安排一趟二日滿檔的開會、抗議、勞教等等，讓花蓮人好不容易來台北一趟，可以有效進入共同決議的討論，且有公開的對外行動以保持戰力。當時順明就是主要的花東區聯絡人了。

新店線 CH221 標的罹病工人，前後有三波，每一次和解後又牽引另一波太晚得知訊息的工人來加入戰線，集體討公道。抗爭啟動後，發現捷運局的板南線 CP262 為搶救大漢溪崩塌工程而緊急使用壓氣工法復舊，竟購買 CH221 標同一套壓氣設備，且未經勞動檢查已違法施工半年。板南線工人在媒體上看見潛水夫症工人的抗爭，才知道自己正處於高危險性勞動環境，主動與我們連絡後，竟被資方以解僱威脅。我們要求官方立即展開勞動檢查，迫使 Cp262 標工地因違法使用異常氣壓作業而被宣布暫時停工。至此，整個「台北捷運潛水夫症聯盟」四十一名工人，總算全員到齊，火力全開，共同展開長達三年的抗爭，引起整個社會對職業病的注意，更暴露國內重大工程的安衛問題，成為台灣第一樁經勞動部正式鑑定為集體職業病的案例。

接連三波新店線工人，及後續加入的板南線工人，由於訴求的標的多元，除了要求資方給予職災補償，也同時標舉公共性的政策變革，對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提出訴求：要求台北市政府協助失業工人加入勞健保十年，並給予醫療與檢驗的補貼，付起長期追蹤照顧的責任；向勞動部要求重新擬訂異常氣壓作業準則，以確保安衛標準；並修改勞保職災傷病給付的法令，讓已離職的罹病工人仍得以請領職災給付。這些訴求的層次不同，但成果陸陸續續到來，這三批工人的利益互有補充，戰力也能彼此聲援。

在公共政策上，「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聯盟」也拉高到公共工程的安全衛生層級，赴交通部，要求彼時正在興建開挖的雪隧、高鐵工程，禁用壓氣工法，有效阻擋了危險工法的擴散。也促成台北捷運板南線的壓氣工程，進行職業病研究調查，證實已有愈八成的罹病率[6]。同時抗爭的戰線也拉長到高雄，拜會高雄市長，提出台北經驗作為高捷的前車之鑑，使數年後的高雄捷運在不得不使用壓氣工法時，加倍謹慎，先以體檢篩檢特殊體質工人，並作好完備勞教職訓，工程並以做一個月休一個月方式，減少工人長期暴露在異常氣壓作業的時間，最後在工程結束時全面檢查未有工人長骨發黑[7]。1998 年的市長大選，「公共工程安全衛生條款」也成為潛水夫症工人對北、高兩個直轄市的七名市長候選人，提出的政見訴求。最後，除了現任的台北市長陳水扁，其餘七名不

[6]鄭天浚等，2000，「異常氣壓（含潛水伕病）作業引起之職業疾病認定參考指引」，勞動部
[7]張陸澎、張致維，2008，「台灣高雄捷連異壓性職業傷害之調查」，中華職業醫學雜誌 2008.15(4):261-271

分黨派的市長侯選人，全都簽署了同意書。

抗爭那三年，對農村來的工人，說緊張是很緊張，在台北街頭拉布條、喊口號都是很稀奇的經驗。定安還記得街頭警察在拉址之間，竟低聲告誡他們：「媒體有拍到就可以了啦，不必太用力衝撞。這樣可以了啦。」街頭攻防戰原來已有一套應對，也算是鄉下人大開眼界。

怕倒是不怕，這麼一群人佔據在台北市政府、市議會，遠離當年的地下坑道，倒像是這才有機會重新認識台北。街道上車子真多，人真多，人們走路真快，那些好奇張望的眼神，還有來採訪的記者會主動把麥克風拿到他們面前，真是前所未有的經驗。雖然他們總謙稱自己是鄉下人不會說話，要把麥克風讓給台北的同事比較頭頭是道，但似乎也只有在那個時候，感覺上好像在台北才不是個隱形人，像是，總算被看見了。

那種被看見，也許就是類似人們說的「尊嚴」吧。做人的道理，互相見面要打招呼，不要像台北市長遠遠知道他們來了就由警察或隨扈包圍著閃開，他們大聲喊著口號被往外推擠，官員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。

倒是每次抗爭後，借用大會議室集體討論，這些過去一起做工的人，現在坐在市議會的會議室，坐在協同抗爭的工傷協會辦公室，共同商討下一步的行動，確實也是奇妙的經驗。還有官員說一套做一套，今天當著媒體的面答允了十年補助的承諾，明天就因為工人直接在街頭攔堵市長抗議的行動，勞工局立即收回給予工人的補助，公開譴責工人是別有政治企圖，被反對黨鼓動收買。這些都令人大開眼界，沒料到電視新聞說的抹黑啊、欺騙民眾啊、政治手段啊，都是真的發生在現實人生裡。

長達三年的抗爭，其實當然也是需要物質基礎的。抗議過程中，台北市政府給予勞健保費的補助，慰問金的發放，醫療補助津貼等，都成為這二三年的基本資糧。已和解的還能繼續行動，訴求更高的政策性的修正；未和解的有部份補助得以再支撐下去，不致缺糧。最重要的，當然還是定期且密集的就醫治療，不但留下完整的健康記錄，也多少阻止了病情更加擴散與惡化。

陸陸續續，新店線前二批工人都和解了，但第三批多數來自玉里的工人，距離遙遠，資方的補償標準提高了，要求工人遠赴台中醫藥學院取得職業病證明，且一定要X光片出現骨壞死現象才肯給付補償金額。順明、志誠、定安等六個人就被排除在和解名單之外了。被一個資方任意調整的職病標準，所遺棄了。

至今怒氣難消的，是當初台北市政府承諾十年的醫療補助、健康追蹤，不到二年就不了了之。還有說好就業照顧的攤位等，全是都市邊緣不合用的攤位，無一落實。我心心念念的則是，「潛水夫症工人聯盟」還曾提出終身捷運卡的訴求呢，希望有個附相片的金卡，像終生榮譽會員似的，進出捷運無須購

票。但台北市捷運局始終不肯。

潛水夫症像個污點，不得已要銘刻在身上留下永恆印記，便遮遮掩掩只求低調交差，不知道把災難處理成具反省性的行動與論述，才會贏得尊重。

罹病工人至今仍飽受病症之苦，但抗爭結束後，健保局又恢復醫療給付的嚴格審查，當年曾是勞保職災給付的高壓氧治療，如今卻要工人自費。自費可是一次九十分鐘一千五百元起跳的昂貴價碼呀，此後幾乎就沒有人再去看病了。

這個無法醫療所衍伸的健康暗面，一直到十數年後被罹病工的身體陸續提領，兌現為骨頭已然發黑的證明，重啟談判的依據。